

# 毛澤東的挑戰

原著：Raya Dunayevskaya  
譯者：秋照

編者按：本文係Raya Dunayevskaya所著「馬克思主義與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一書中的第十八章，下分四節：一、中共的反革命行爲；二、毛澤東思想的演變；三、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制經濟；四、中蘇共可能發生戰爭嗎？按原作者曾任托洛茨基秘書，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與分裂，有其獨到的見解。茲由秋照女士譯成中文，交由本刊發表，敬希讀者留意。

## 一、中共的反革命行爲

「有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醫治百病，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教條並不如牛糞好，牛糞還可以做肥料。」

——毛澤東

曉夫對「中國同志」的加入反動「原子戰爭販子及狂人」表示「惋惜」，他們的這些相互指責都是因權力政治而發出的。雖是如此，這並不等於說理論之爭既沒有它自己的邏輯性，也不會影響到權力爭奪。我們不要讓自稱為共產黨員的雙方所蒙蔽，忽視了他們的階級本質，其實，雙方都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者。在他們的極權統治之下，國家資本主義僅是採取了另一形式，內容並沒有改變。促使他們公開衝突的內在力量並不是偶然的。中蘇共第一次分裂的一九五九年，不僅是赫魯曉夫欲提倡「大衛營」精神，拜訪美國；不僅是中共侵入印度邊界的那一年（一九六二年），在這時期，蘇聯與中共的內部都有着嚴重的事情發生。尤以中共內部，事態更為嚴重。自然災害之外，還加上人為的災害，這是那些極權統治者欲藉大躍進——加於人民的不人道奴役，一舉而將全國工業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其結果，不但未在一夕之間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反而使六億五千萬人民陷於飢荒或接近飢荒的邊緣。

儘管中共不斷叫囂着好聽的革命詞句，整個毛澤東的歷史都證明他是一個反對教條主義的戰士，而不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毛指責赫魯曉夫是個懦夫，從畏懼核子訛詐進而畏懼革命，赫魯

曉夫對「中國同志」的加入反動「原子戰爭販子及狂人」表示「惋惜」，他們的這些相互指責都是因權力政治而發出的。雖是如此，這並不等於說理論之爭既沒有它自己的邏輯性，也不會影響到權力爭奪。我們不要讓自稱為共產黨員的雙方所蒙蔽，忽視了他們的階級本質，其實，雙方都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者。在他們的極權統治之下，國家資本主義僅是採取了另一形式，內容並沒有改變。促使他們公開衝突的內在力量並不是偶然的。中蘇共第一次分裂的一九五九年，不僅是赫魯曉夫欲提倡「大衛營」精神，拜訪美國；不僅是中共侵入印度邊界的那一年（一九六二年），在這時期，蘇聯與中共的內部都有着嚴重的事情發生。尤以中共內部，事態更為嚴重。自然災害之外，還加上人為的災害，這是那些極權統治者欲藉大躍進——加於人民的不人道奴役，一舉而將全國工業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其結果，不但未在一夕之間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反而使六億五千萬人民陷於飢荒或接近飢荒的邊緣。

中央這種以革命為榮的態度是指向國外的革命而說的。其實，中國內部的羣衆才真是想要革其統治階級和毛澤東的命。在短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間，反對一黨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清晰和堅決，致使爭鳴者遭到殘暴的迫害。

若不了解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全球上所發生的事件，就很難明白中共領導者當時在它國內、外所面臨的局勢。匈牙利革命不能被看作只是一個國內的革命，同樣，中國國內的不滿也不能只看作是一國之事。中共和匈牙利當時的情形都可以導致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係正在新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發育。

的改變，並發展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

一九五六年，爭取自由的鬥爭在世界上展開了新的一页。它開始於二月裏赫魯曉夫的反史大林化。赫魯曉夫希望藉此緩和東歐革命社會中的許多不安因素。這一年以匈牙利革命作結束。匈牙利革命使人無容懷疑地看清楚了這些為自由而奮鬥的戰士所要求的自由是應當從共產主義社會那邊去爭取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頗為自信地認為他可以如一個仁慈的「太陽」，允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會有危險。孰料中國人民「爭鳴」「齊放」得如此激烈，它暴露了中國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更進而揭穿了把毛澤東捧為實現馬克思解放理論的英雄的謊話。

官僚主義者的瘋狂和他們對於邏輯與現實的無知，使他們總是要想盡辦法使現實事物去適應他們的理想，一旦發現人們不能按照他們的意願被改造時，便認為這些人應當被毀滅。這正是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分析精神的自我脫離的抽象哲學演變——所謂「現實與思想的絕對顛倒，它們間的完全脫離」的一個活生生的實例。

在中共，自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開始到六月中短期公開爭論，說明了中蘇共的基本分歧和中蘇共對美國的基本爭執，同時，戰爭與革命的問題也被提示到要點上來。雖然實論自由在中國只是舉花一現；雖然中國官方並未將反對方面的言論完全公佈，但要求自由的呼聲能衝破這些阻礙，猶如它能衝破言語的隔閡一樣。對於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來說，匈牙利自由戰士所說的不是他們的馬札兒話，非洲革命志士所說的也不是他們的士華希利語，他們的言語能被所有的人所聽懂，我們聽懂了來自中國的爭取自由的呼

聲，我們便自覺地與他們站在一邊。他們的行動是人類爭取自由的語言，讓我們聽聽他們的革命呼聲吧！

### (11) 反叛的呼聲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卅日標題說道：「她稱民主化的，但是，我們這裏的社會卻沒有民主，這種社會我叫它是基於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

林希翎，廿一歲：「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極其簡單的，但是，我們這裏的社會卻沒有民主，並且，引用恩格斯的不能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列寧對社會主義即是消除階級的論斷作出結論，說現在的蘇聯和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她大聲疾呼地要求去尋找真正的社會主義，並且宣稱要用激烈的手段改變目前的社會制度。」

日。

瀋陽師範學院共青團宣傳部主任，張寶盛（Chang Po-sheng譯音）：「所有的重要的事情只憑六個人就決定了，這六個人是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總理和幾個高於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首長。六億人的命運就操在這六個人的筆下，他們怎麼能够瞭解下面的情況呢？最多不過去黃河觀察一趟或游過長江。」（瀋陽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

中國民主同盟，天津民房計劃局工程師蘇培英（Su Pei-Ying譯音）：「當共產黨進入天津時，他們說這是革命，我們的革命不是改朝換代。現在，我看起來，革命比改朝換代還壞，在這個社會裏真是傷心。」（新華社通訊，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

民革副主席龍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給了她的盟國一部分貸款和借款，後來，有些國家拒絕償還，美國也就答應免除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假若我們能還清蘇聯的借款，至少也需要十幾年，並且我們還要付利息。中國是為了社會主義打仗，你看得到這樣的結果。」（新華社通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龍雲的離奇觀點）。

鄉、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工人，把本來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叫作行政領導下的「工人管理科」，「官僚主義的舌頭」和「行政的尾巴」等……工會脫離羣衆到這種程度，不是工會工作的「危機」嗎？」（李峯，八千里走馬觀花記，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

中國人民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驚惶虛榮』、

「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黨員起了監視羣衆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羣衆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摧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卅一日）。

瀋陽師範院校刊編輯黃清路（Huang Chen-ju回譯）：「共產黨有一千一百萬黨員，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六億人民變作了這百分之一的人的馴服臣民，這是甚麼原則！」（瀋陽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

中國民主同盟，天津民房計劃局工程師蘇培英（Su Pei-Ying譯音）：「當共產黨進入天津時，他們說這是革命，我們的革命不是改朝換代。現在，我看起來，革命比改朝換代還壞，在這個社會裏真是傷心。」（新華社通訊，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

新華社記者，一九四四年加入共產黨，戴洪：「舊的統治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升上來了。這樣的演變將會引致與吉潤合併」。新華社，北京，八日十七日繼續報道：「匈牙利事變發生後，戴洪不贊成蘇聯出兵幫助匈牙利鎮壓反革命叛亂……他污蔑人民的新聞事業是『愚民政策』。他處處攻擊新華社的領導。」

新華社，廣州，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廣東省委會勇敢而徹底地揭露了目前在省的工作中所找到的矛盾……領導與羣衆之間的矛盾，它們主要表現在幹部的不民主作風上，幹部目無法紀、缺少訓練，用強迫和命令方式執行政策；拒絕公開賬目，引致部分合作社的幹部貪污腐化；幹部不參加體力勞動，他們的補給工資過高。所有這些都使得羣衆不滿……從去年冬天，全省有十一萬七千九百一十六個農戶陸續從合作社中退出，現在已有十萬二千一百四十九戶重新加入了。」

鳴放運動剛開始了六個星期，便斷然被中共所禁止。這些警惕性特高的中共領袖們，在他們所開放的小民主國中，並未聞着花香，只見滿園「毒草」。當然，他們不能允許這些「毒草」生存下去。再說，即是這個值活六個星期的民主也是得來不易。毛澤東針對知識分子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是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裏就已提出的，但是，原稿並未發表。其後，隨着這運動的展開，引致一些學生、工人的鬧事行動，同時，匈牙利的解凍也爆發成了革命運動，但毛澤東仍然覺得，他可以把中國的有限解凍挾制在他的一派專政的老虎鉗內，因此，一九五七年二月廿七日，他重新作了一次名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究其內容，既無自由，也

無矛盾，把人民說成非敵非友，總之，鳴放被套上了許多框框，完全失去了原意。他還覺得不够，再加上許多註釋補充，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最後發表時，竟變成了攻擊右派的工具和藉口。

史大林的名言「消滅富農階級」與毛澤東的

中共的宣論自由，就這樣殘暴地被摧毀了。

中共採取極權政府慣用的鐵壓反對派的方法，在漢陽，將三個學生領袖在萬餘觀眾面前公開處死；在其他地方，不是把這些「右派分子和知識分子」關進監牢，便是送去荒野地區勞改。面對廣大的反對勢力，毛澤東不但沒有退縮，更進而抬出了震人聽聞的「人民公社」的招牌。

### (三) 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試行舉辦第一個模範人民公社，為紀念一九五七年十月蘇聯放射衛星，它被命名為衛星公社。那次蘇聯放射衛星，它在蘇魯曉夫與毛澤東身上所產生的反應極為不同。赫魯曉夫明白，所謂蘇聯的「超過」美國並不是全面的。鎮壓匈牙利革命和將東歐控制在蘇聯掌握之下的代價已經非同小可，為了對東歐國家的一億元短期信用貸款，蘇聯便不得不削減對中共的大量援助，並且，匈牙利革命，既擾亂了本國的經濟，又影響了蘇聯五年計劃的執行。這些都促使赫魯曉夫考慮到與美國進行談判一項長期貨款方式的具體貿易。因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大會的宣言中不僅認資本主義，同時重申了「和平共處」政策。

當時在蘇聯的毛澤東並不作如此想。他認為蘇聯的人造衛星已使國際均勢急劇改變。共產主義陣營已能從小戰到大戰，不論採取任何方式的交鋒，均可向「美帝」挑戰。因此，毛一面簽署了「修正主義」，同時重申了「和平共處」政策。

他們吹噓要在農場煉鋼，實際上，花費了許多精力把鐵礦運到農場，但經小土爐所煉出來的產品，盡是些質量很壞的生鐵——所含雜質太多，連煉鋼廠都拒絕使用。北京最後不得不承

認。該年的豐收，加上毛的狂妄自負，都助長了此種幻想，以為可用軍事化的方法，將全國勞動力組織起來，就可以戰勝科學。

「人民公社」相形之下，應大有愧色。毛將中國所有農民——中國的人口總數為六億五千萬，其中約五億人為農民——都趕進了他的人民公社。他們住在被圈定的宿舍裏，照軍隊編制，被驅進會，便是去修水庫，或者成羣結隊的去燃燒土法煉鋼的小高爐，總之是不許他們有空閒。毛澤東還計劃在城市組織人民公社。這種勞動力的軍事化和集中使用，被稱為「動員羣衆」或「羣衆路線」。毛澤東說，照這種方式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能在十年之內完成蘇聯需要四十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並說中國可以長驥直入的實行

共產主義。

這個極權政府是這樣的急功近利，不擇手段，它於八個月之內便將一億二千萬農戶——原來的七百四十萬農業合作社，每社以一百六十戶計——組成二萬四千個人民公社，每社平均不下五千戶。它們宣稱這樣同時就把成千成萬的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了。解放的結果，是她們必需跟男人們一樣地整日在田間工作。孩子們被送去托兒所，老人們被送進「幸福院」。全體都在公共食堂吃飯，以前只為家人燒飯的婦女現在卻要為八千人進食的食堂準備伙食。

中共中央決議：「人民公社的活動，包括當

地的工業、農業、交通、教育和軍事工作。」

他們吹噓要在農場煉鋼，實際上，花費了許多精力把鐵礦運到農場，但經小土爐所煉出來

認，一九五八年在各地方上所煉出來的鋼中有三百零八萬噸是不能作工業原料的生鐵，應將此數在鋼產總數中扣除。總路線的方針沒有把生產力解放出來，只帶給人民無盡的痛苦。公社中的紊亂現象，非人的生活環境和勞動力的浪費，其嚴重程度會使那些極權政府的官僚都感到震驚，他們還慈悲為懷地說，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就足够了，工間操和開會的時間不能把八小時睡眠之外的時間全部佔去。他們也被迫地承認了最低限度的個人自由。「公社是領導社員參加集體生活的，每人每天必須工作十小時，理論學習兩小時……」中共中央規定：所有社員，在每天十小時工作，兩小時理論學習之外，其餘的時間可以自由利用；丈夫與妻子可以有單獨的房間；社員可以在宿舍中自燒茶水；婦女可以利用閒暇補衣做鞋。……對於中共中央的上述規定，社員們極表歡迎。」（新華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日電）。

中共在人民公社中的工業並未全面發展開來，它的全國工業產量卻「超過了生產指標」，使他們有「喘一口氣」的餘地，於是他們又叫出

「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口號。如果進一步不是以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而僅以工業發展來衡量，如水利灌溉是完全在強迫勞動之下完成的，不可否認，中共是有些進步的，它的工業上升的速度，遠超過亞洲另一個國家——印度。

中共一九五八年計劃中的巨大目標對於落後國家，有過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現在中共面臨飢荒，卻又使那些落後國家不得不重新考慮！這是中共狂妄的領導，不顧社員生活是多麼艱苦，一貫用暴力迫使人民不分晝夜地工作，以圖一夜之間在全國實現工業化的結果。下面是他們自己公佈的統計數字：

項 目 第一次所公佈的修正後所公佈的  
一九五八年產品 一九五八年產品  
—— 數字 數字

鋼（百萬公噸）	一一·〇八	八·〇〇
穀類（百萬公噸）	三七五·〇〇	二五〇·〇〇
棉花（百萬公噸）	三·三一	二·〇〇

中共尚未公佈目前農業產品的統計數字。大家都知道，中共在口頭上雖然仍用「公社」的名稱，實則已將權利下放到以生產隊為單位。大的生產隊包括二百到三百戶，約為一個村莊，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時的合作社無異。小的生產隊只包括三四十戶。公社資產的所有權在名義上屬於生產大隊，而勞動力、土地、農具和牲畜的調配應用等權力，則操在生產小隊的手裏。

所謂新的工作方法，並沒有採用大躍進的離奇方式，而仍是依循着第一個五年計劃以蘇聯為榜樣而進行的。中共將錢荒的責任推在那些不了解政府政策的幹部身上，並說有人「利用自然災害和基層幹部的缺點進行破壞活動。」那麼，再來一個新的整風運動似乎是勢在必行的了。

其結論是將「那些不瞭解全局，做事粗枝大葉又不虛心學習的領導生產的幹部，下放勞動改造」。新的指示是「合理評定工資，按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這一原則，實際上已涵蓋着濃厚的計件工資的氣味。

中共雖然認識到技術設備、專家設計，降低成本和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但他們並未放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這三面紅旗政策。他們指向亞非洲的宣傳是，落後地區也可以通行無阻地由工業化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羣衆路線」比先進的科學更能創造奇蹟。

無須等待中共兩年後才發表的對大躍進的修

基層的國家，要工農同時並舉、齊頭並進，完全是一種荒謬的做法，他更不欣賞毛澤東把妄想說成是理論，中國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並不比蘇聯的更簡捷優越。

中蘇共的破裂，不是在公社運動時，而是當毛澤東企圖告訴赫魯曉夫應如何指揮對美戰爭時發生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赫魯曉夫不顧毛澤東的反對去到美國會晤艾森豪威爾。此大衛營精神一直維持到一九六〇年五月U-2間諜飛機事件為止。莫斯科與北京對戰爭與革命的不同解釋的根本矛盾是權力爭奪，並不是什麼理論不同。形成這些權力爭奪和對理論的不同解釋自有其客觀因素，下一節我們將要討論這些客觀因素的根源。

毛澤東的反對去到美國會晤艾森豪威爾。此大衛營精神一直維持到一九六〇年五月U-2間諜飛機事件為止。莫斯科與北京對戰爭與革命的不同解釋的根本矛盾是權力爭奪，並不是什麼理論不同。形成這些權力爭奪和對理論的不同解釋自有其客觀因素，下一節我們將要討論這些客觀因素的根源。

## 二、毛澤東的思想演變（一九二五—一九四九）

——黑格爾

在不同的環境下產生不同的思想。毛澤東從

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到取得大陸政權的廿二年間，他的思想辯證演變的必然結果，與斯大林如出一轍，通過一系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而走到它的絕對反面——一頭一黨專政的極權共產主義。在這點功績上毛澤東可說是有兩點貢獻：（一）軍隊：包括在政府編制內和編制外的軍隊。（二）思想改造：洗腦最初原是毛的「四個階級聯合政府」的附屬品，結果它被應用到每一個階級身上。上述兩點貫穿着毛澤東的所為活動和著作，並成為這些著作和活動的前提，尤以實踐論與矛盾論兩篇為官方指為「毛澤東思想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典範。我們必

須明白，事物轉化為它的相反面並不純是一個學術問題，它是客觀存在着的事實。要探尋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國政權與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中蘇分裂同屬重要，它的根源更應該追溯到一九二五—一七年的革命失敗時期。毛澤東自己也說，中國的革命起於那時，因為，從那時起才開始有革命戰爭。此處，我們不妨也附和毛澤東，將一九二五—一七年的革命失敗時期作為毛澤東思想的起點，因為毛澤東從那時起就開始損害馬克思主義。

### (一) 革命的失敗

一九二五—一七年中共初期革命的失敗，不僅是無產階級，同時也是農民的失敗。雖然，在城市——蔣介石的政府、軍隊、監獄和警察的中心——無產階級很難逃脫「反革命」的報復，在鄉下，卻可逃往深山荒野裏去避難。

估計毛澤東早期，在逃避蔣介石不斷的追剿時，必然發現了兩件事——中國之所以有許多軍閥存在並不是偶然的，和軍隊必須與羣衆的力量相結合。他將游擊戰術，而不是農民革命，放進了他的理論。於是紅軍，不是窮農農民的組合，卻變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政治、軍事、哲學和經濟的——綜合動力。共黨攻城陷鎮，每佔領一地，即用紅軍的武力實行土地改革，那時，它可能會得到農民的支持。但是，當共黨政府依靠軍隊的力量來控制農民時，是否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就有疑問了。這是關鍵之所在，僥倖，毛澤東此時還不急於寫他的理論。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在他的動人的處女作，有關自殺的農民革命的文章中——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沒有把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作為一種理論來敘述，也就是這

個原因。毛對史大林的「四大階級」政策完全同意，這政策在導致革命失敗的原因中所佔的分量並不小。儘管毛的報告充滿了革命熱情，他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只描述了「開明紳士」和「土豪劣紳」，「誠實的官員」和「貪污的官吏」，只說「新的民主秩序」而未提及社會革命和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

農民起義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特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也不例外。不過，毛澤東於革命失敗後在湖南組織的紅軍並不是農民的自發運動。恰恰相反，「這個紅軍並沒有農民的支持，在許多地方人們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當被問到他的軍隊裏是否有土匪和流氓時，毛澤東的回答卻很風趣，他說：「他們是很好的戰士。這支在戰爭中成長的紅軍極有訓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它衝破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縱貫中國南北二萬五千里的戰備行軍，亦即著名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長征。

然而，這個常被談及的長征卻有被人忘卻的另一方面（此處未提及朱德，他的任務雖然很重要，但並不影響毛澤東主義），那就是：他們在途中停留時，到處侵佔村莊，搶掠糧食，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由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一手包辦的「蘇維埃」所管轄的地區正是中共紅軍的控制地區。人所共知，在這以前從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領袖在還沒有羣衆運動的地方建立一支軍隊並稱它為「蘇維埃」的。

這些為了保護自己，求取安全和生存的手段都被放進了「革命理論」。不僅如此，毛澤東自其早期開始，對其黨內反對派攻擊之殘酷，比對蔣介石更甚。所以，當時主張基於馬克思原則，以城市無產階級為革命重心的李立三路線就被打倒了；所以毛澤東大言不慚地解決了在城市中建立

的江西蘇維埃，毛澤東還親口對史諾說，反叛者應當立即被「解除武裝和消滅」。就這樣，在一九二七年失敗之後，毛澤東完成了恰如反革命蔣介石所做的，使共產黨與工人的關係完全脫離。

一九三六年，毛澤東把反對他的「農民蘇維埃」政策的張國焘打敗了。隨後，與蔣介石組織聯合陣線，共同抗日。此後，便又開始打擊贊成抗日和反蔣闖蕩過重要。

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前後，在行動和理論上，都是以攻擊「教條主義」著名的。我們找不到他有一點反對修正主義的痕跡，直到最近他與赫魯曉夫為爭共產世界的領導權而發生爭執時，他才忽然發現他有自稱「正統」的必要。這種會充正統派的姿態完全是做給中國以外的人士看的。為避免人們揭破他的偽裝，他只好把重點放在他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貢獻」上。說是創造倒是真的。從毛的起家到取得政權，他沒有一點與馬克思主義有共同之處。試看他的由鄉村包围城市的戰略，並非策動工人革命，而是要他們在他奪取城市時繼續生產。

固然，當毛覺得需要把他的取得政權的途徑說成是適用於世界，尤其是落後國家的革命理論時，他的「正統」便不能止限於「創造性」的結論」的文章，一再廣泛地強調取得政權的途徑是先在鄉村建立革命的小據點，開始時，這些據點為數不多，逐漸由數個發展為許多個，然後再包圍城市，直到最後佔據城市為止。

該文又說：「毛澤東同志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堅守這些開始時為數不多的小地區的革命據

點，然後繼續擴充發展，這樣，便一步步地接近了取得全國政權的目標。」

毛澤東並沒有強調農民在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樣便會相對地減輕了工人的地位，他反過來還指責早期中共領袖們所創辦的農村蘇維埃，雖然，他當時不是坐第一把交椅，但至少也是其中的領袖之一。他分析那時的情形說：「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選英文版第四冊第125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他的部下扣留在西安，毛澤東運用政治壓力，使蔣介石得以被釋放，並恢復了全國統一戰線領袖的地位，這些都是毛的功績。

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毛又說：「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農民，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和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羣衆。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五年期間實行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政策，也不應重複。……各地在平分土地時，仍需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

再則：「我們已採取不充公富農土地的決定……我們也不會將大、小資本家、商人的財產、工廠充公。我們保護他們的企業……在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是

一致的。……我們認為使其它政黨、社團對我們不懷敵意，最為重要。全體一心一意，抗日救國。至於其它問題或有不同意見，我們不認為重要。」

總之，毛的支持貧農，最革命的農民，有如用根繩子把他們吊起，有害無利。在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法——主張將中農以上的田地全部無償充公——被廢除以後，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在黨內全部崩潰以後，一九三七年毛終於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袖。

毛要反對城市工人時，他就站在農民一方；他要打擊反對他的地主時，他就站在貧農一方面；當他需要利用地主抵抗日本人時，他又去保護地主的權利，甚至還代地主收田租了。在農民中，只有他的農民軍隊才是他始終不渝地關心着的。這樣以軍隊和黨組織作為兩個平行的政治工具，即是在所有執政的共產黨中，也僅此中國一個。為了要把毛澤東捧成「最伟大、最英明的革命領袖、政治家和現代馬列主義理論家」，就得先把著作質疑論和矛盾論的毛澤東吹成是個「哲學家」。我們現在來看看他這兩篇論著吧！

### (二) 延安時期的「哲學」·毛澤東

#### 歪曲列寧

「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死硬派……我們反對左傾空談主義。」

——毛澤東

—— 中共由第一個「蘇維埃」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四）到延安時期（一九三五—一九四五）之間的政策的激劇轉變，引起了許多共產黨員的懷疑；抗日時期共軍與蔣介石軍隊的合併，又被許多紅軍中人士目為反動，毛澤東稱這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毛與教條主義的競爭和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同時進行着。

客觀研究，認為頗有懷疑。這兩本書是到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才出版的。不管怎樣，我們只好接受中共官方所說的日期，尤其是這兩篇文章被說成是既客觀又主觀，既可論為昨天又可論為明天之用。毛的崇拜者當然更不在意毛是否把日子

說得早些以證明他有先見之明；或是重寫以便利目前的需要。那就是說毛為了要推行他的階級合作政策，正面攻擊教條主義還嫌不够，更採用了「哲學論文」的形式作為幫手。這兩篇論文是如此空洞抽象，使人找不到它的主題和目標。在實踐論中毛寫道：「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認識若真是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他倒應該先說明他說的是什麼實踐。他不但未曾講清楚，反而把實踐論模糊地說成是開用性，並似出自列寧的哲學筆記。毛摘引列寧的句子「實踐凌於理論的」認識，他沒有說明，列寧在此地，只是重述黑格爾對「實用概念」與「理論概念」在結合之前關係所作的分析。列寧說：「恰正是在認識論中。」

列寧決不會把理論貶低到成為「實用性」，就在毛所引用的句子的同一段中，列寧說：「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它」。此句就在毛所引用句子的前面，毛不可能完全誤解它的人的意思，除非毛是有意歪曲列寧。不管詭辯家毛澤東所寫的是什麼，他的目的是如此卑鄙——迫使他服從他與蔣的聯合陣線，人們就不會把他的這篇文章作哲學著作了。

只是因為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暴君控制着不下六億五千萬人，才有人要去分析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同時進行着。

思主義的創造性的貢獻」。

很明顯地，毛並未說服他的聽眾或讀者，於是，另一篇哲學論文又出來了，叫作矛盾論，是針對教條主義者而發的。他們說，這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所作的演講詞。

在矛盾論中，毛又運用了他的「實用性」的伎倆。不過，它的好處是，至少能由此文中，看到他如何篡改歷史，以便糾正那些黨內反對蔣介石的教條主義者的錯誤。他說國民黨在一九二五年的統一戰線時期是「革命的、有朝氣的」，「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他把革命的失敗歸罪於托派領袖陳獨秀和他的路線；「中華蘇維埃」（現稱革命根據地）的喪失歸罪於機會主義分子的錯誤，而不提蔣介石的固執。

「一九三五年以後，」毛澤東講到矛盾論的哲學意義時，在堆砌了一大堆空洞的詞藻之後，更夸夸其談的說：「它（中國共產黨）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接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它（國民黨）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此時，蔣介石是毛澤東聯合陣線中的盟友，毛所指的當然就是「正確的革命方面」。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這個人常常說：「我們中國人常佩戴階級合作論者溫柔地說：「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

毛澤東的骨子裏浸透了孔夫子的思想。恐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矛盾論已把黑格爾——馬克思的發展論歪曲得面目全非。一九一五年，列寧重讀並評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時，就看到其中的深奧。列寧認識到事物的發展過程，係通過對抗而轉化到相對方面，這就使他找到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圓滑——第二國際——的失敗的根源。

毛澤東對於哲學上事物的矛盾、對抗及其發展，無所知。他發明了個「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倒真是他的創作。他將「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區別開來，這就與他篡改歷史一樣，他賣賣了哲學。於是，這篇文章的旨意現在就變成了在某種情況下「甚至主要的矛盾便都暫時地降到了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又由於「發展不是順利的」和「互相的轉化」，以致經濟基礎會「降為次要」，而「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會變成決定性的因素」了。為了掩飾他的赤裸裸的主觀主義，毛再對讀者說，共產黨員當然是唯物論者，「總的看來，他們認爲物質決定意識……」。毛澤東的東拉西扯，混淆不清，則正是康德所指的「宇宙論證」是「一整篇沒頭腦的矛盾」。

有一位近由中國大陸旅遊歸來的人說，他聽見一個陝西（Shensi）的地方黨支部書記說：「經過理論學習，我明白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分段論的原理，並把它應用到鐵錘工作上來。」這個人說的「領袖」將理論降至「實用」的結果，這些中國人驗證了他的名言「教條比牛糞還無用」。

上面講述哲學時，說到毛澤東的卑鄙，真使人作嘔，當然，更不願再去談論這個極權中國親熱地叫着的「毛澤東思想」，不過，我們不能忘了毛澤東的權力。我們記得，當毛促使中共採取與蔣合作的聯合陣線，實行他的「三·三」制方針——共產黨行政機關內有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三分之一國民黨，三分之一無黨派人士——時，正是抗日戰爭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那時，有些前去訪問的外國記者，雖然他們的文化水平比毛的軍隊高許多，毛的有關文藝方面的演講卻使他們驚嘆不已。他們對國民黨的某些缺點感到灰心；

對於共產黨的積極抗日，組織羣衆，邊區辦學和土改政策，賛揚備至。再說，毛的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不但吸引了許多小資產階級，甚至一些地主和反共人士也誤把共產黨當作了只是些土地改革者而接受他們。毛澤東除了抽去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的階級內容外，對馬克思主義毫無貢獻。可是，他的的確確明闡了一條走向權力的特殊途徑。要弄清楚這些，就必須把他所謂的「三個法寶」合起來看。

### （III）「三個法寶」

史大林把工人的國家改變成了一個國家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並將它理論化，稱爲「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假定只能在蘇聯不受外力攻擊時，才能實現。因此，史大林便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變作了保護蘇聯安全的前哨，使它擔任獨立的階級任務和工作。在中國，它便是這個精心製作出來的「四大階級陣線」，把中國共產黨有效地降爲會促使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的國民黨的附庸。毛澤東爲權力競爭和其成功前後，都以這「四個階級陣線」又稱「聯合陣線」爲他思想的經緯。

毛將史大林的對外政策應用到內政上來。他是一個實踐主義者。他是絕對的「神奇」，可以看到所有階級中的積極因素，這樣當他踏上了權力之途便通行無阻。取得政權後，他只消滅了「官僚資本家」和「土豪劣紳」，而未把資本家或地主當作一個應消滅的階級而除去。他很自信，認爲可能從思想上改造資本家和地主，這就是他的「整肅」與史大林的「清黨」不同的原因。他看不見自己統治下的階級間的區別，相信一個「協調的世界」，難怪，所有的矛盾都是「相成」的了。

紅旗雜誌上近有一篇文章——「統一陣線」使得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法寶——更為明顯地把聯合陣線說成了一種沒有階級觀點的矛盾論哲學。實際上，它也確是毛澤東在得勢前後一貫牢牢掌握着的法寶。自一九三七年毛就把它當作了思想和現實的經緯，近期，中共中央期刊上的這篇文章又把它的現實意義延展到今天。毛在大陸鞏固政權以後，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浪費、反貪污和反官僚主義——時，和在其後的五反——反行賄、反漏稅、反營私舞弊、反盜竊國家資財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中，它都仍是毛手中的法寶。此後一段時期，毛因為要為他的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基礎上和政治建築上打下根基，他便打擊他曾自抗日戰爭一直帶領過來的私人資本家和地主階級。

為此，他不得不加紧他對無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攻擊，這些人還在相信這是步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整肅仍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哲學旗幟下進行的，這事並不是偶然的，不過，矛盾論現在發展成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同時，一黨專政的老虎鉗，一下子鉗住了「百家爭鳴」。

毛永遠就是這麼一個數學家，「早在一九三九年，基於黨的十八年的豐富的歷史經驗」，他把一個法寶發展成了「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三個法寶的基本問題，是中國革命打敗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

除了統一戰線、軍事鬥爭和黨的組織三個法寶之外，又有了國家權力，這個主張「四個階級聯合陣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毛澤東想起了他是應當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政的。對於手中有了三個法寶的毛澤東，這當然不會有因

難。毛說：「人民的民主專政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進行的。」誠然如此，但是是如何進行的呢？對中共的主席來說，這太簡單了，有如在同一圈中跳進跳出，反正，中國只能有一個統治的政黨，那就是「通過共產黨」體現無產階級專政。毛簡單地又把三個法寶歸納歸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將我們的經驗總結集中為一點，就是：在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基礎上，以工人（通過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的專政。」

毛已準備用一步「大躍進」直接進入「共產主義」，不用說，他當然不會在躍進「和諧的大同世界」之前，停留在「工人與農民的同盟」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小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通過工人階級的領導，已經讓位給了人民的民主和人民的共和國了。這就使得通過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消滅階級，進入一個和諧的大同世界，成為可能。」

### 三、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制經濟

儘管中共方面的文件極盡歌功頌德的能事，許多學者對中共又起用了「東方的專制政治」這一名詞。這種議論甚至影響到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對「毛的中國」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恰當地把它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毛本人充滿了軍閥主義的色彩；他的修正的馬克思主義下面，隱藏着一層牢固的中國民族主義；他的思想徹底地浸透了儒家精神——他所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完全是一個暴力政治——從這些方面就很容易得出「東方專制政治」的結論，而這結論又似乎很合邏輯。仔細省察中國的社會，從她的家庭生活、主導思想、工業，一直到農業，國家資本主義的標誌都極為明顯。

追溯這個所謂「東方專制政治」的發展，既

不能弄清楚它的經濟演變，也不能說明中蘇共的衝突。同時，毛的中國與印度正在亞、非和拉丁美洲，為了各自的影響力而競爭。這些都使我們感到有對目前中國的經濟和理論作重新研究的必要。

#### (一) 農業方面

毛成功的根基並不是建立於一種停止在靜止的農業生產狀態中的東方專制政治之上的，恰恰相反，在毛的十餘年統治中，中國的農業狀態不斷地在起着變化，似乎從來沒有「平靜」過。事實上，正是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機構，策動了從第一次土改，經過執政後的土地改革運動，直至人民公社一系列的農業改革；也正是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機構，幫助中共渡過了危機，免於崩潰。

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土改中，只有三百萬農民未受影響，假若這樣就是把土地分給了農民，真是對長期受騙的貧苦農民的一個莫大的謠話。每個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平均不到二畝（一畝等於六分之一英畝），有一千萬地主被清除了；據估計被殺的不下五百萬。很明顯，全中國的剝削階級中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總數不會有五百萬，毛為了要剪除他在革命隊伍和反革命隊伍中的敵手，把所有反對他的人統統稱為「官僚資本家」、「大地主」或「右派分子」，在這些名目下，他又把成千上萬的人送去勞改場，修馬路或做水利工程。同時，為了保證中共全面控制國家政權，他剪掉了一些會幫助他取得政權的「土豪劣紳」和資本家，並使中央政府得以轉過頭對付那些分得不够維持生活的二畝地的農民。

舉辦合作社的初期，只是鼓勵農民加入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推動頗為緩慢，到一九五五

年，步伐轉趨急速，全國百分之九十六的農戶都組成了合作社，社員對自己的土地仍所有所有權，也允許保有私有財產，社員可以為自己的十分之一的土地耕種。這段時期中的農產品的猛增和豐收替毛澤東後來的異想天開的「人民公社」打下了基礎。

中共的大躍進並沒有成功，上述一九五八年狂妄企圖的失敗是人所共知的。不過，我們不應忽略，中國的極權統治者所叫聲的，不需高度技術，只走「羣衆路線」就可實行的「不斷革命」——「不停止的革命」，對於其它工業落後的國家所發生影響。

紅旗雜誌近期曾說：「在使農業機械化成為可能以前，發展農業、提高生產力以促進工業的發展是極有可能的」。我們的中國理論家，並沒有因自己的倒退因果而有所顧慮，繼續提倡他們的有關工農聯盟新基礎的同時性論：「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這個新基礎是由兩方面同時逐漸並進的。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方面是通過合作社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這條路，我們就會……讓所有農村的人民共享大策策。」

儘管這個「大策策」最後變作了不可掩飾的飢荒，對於這個東方式的專制政權有什麼關係呢？對於人口過多的亞洲和人口不足的非洲，能打動人心的是那些現代化口號，又不是東方式的專制政治。

### (二) 軍事與工業

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某些缺點雖然會幫助了毛的軍隊取得政權，但不能說毛的成功全是歸功於此。如果我們把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缺點當作毛的成功的唯一因素，則是忽視了毛在內戰中的戰

功，和中共廿年中被隔絕於城市所賴以維持生存的組織。無疑的，毛的統治根基仍是舊的中國，包括她的莊嚴和腐化，軍閥和官吏。我們現在所要分析的是那些區別時代的標誌，並不是那些模糊觀線，使我們分不清甚麼是新的、甚麼是與我們時代的相同之處。

我們的時代是國家資本主義、民族革命和工人起義的時代。只有羣衆才能創建一個真正的新社會秩序，除非你是置身於他們的行列之中，否則，離開國家資本主義之外，你無路可走，而且，不管它是怎麼樣的個人活動，或是中國的農業社會，都不能例外。至於中國，它的農業發展是如此遲緩，致使它不是需要建立在一個新的人力的基礎上便是需要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比如，滿洲在日本統治時期會有些工業建設，勝利之後，這些工業建設成了無主之物了。即使國民政府也看到下一步必需做的事，一九四三年，蔣在中國之命運中說：「最後地改變資本為國家資本是如此地迫切，我們必需採用計劃經濟。」毛澤

東在取得政權後，立即着手這一項工作——國有化工業。附加一句，他用的是以前政府或其他資本家同樣的剝削工人的方式。

蘇聯對中共的一百五十六項重要工業裝備一

當資本家把利潤累積得太多時，他就來個五反運動；工人反對不合理的十二小時工作或無個人自由的工作環境時，他就發動「整風」。政府將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公私合營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時，他們叫這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資本家同時被留在原企業中做經理，如此：「假如你對發展你的企業會花費心機並有好的成績，也會把你的兒女培養成第一流的技術家，很自然地你當然會被安置在國家企業中的負責崗位上，你會發現做一個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經理比做資本主義得多。」難怪，很多資本家就這樣作了企業中的經理了。

工人不許罷工。工會成了單純的訓練工人和監督實現生產計劃的機構。強迫勞動是這個自稱共產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的正規制度。在這些方面，中國與她的蘇聯前輩沒有區別，她們的不同在於對「思想改造」有不同的觀念。

(三) 洗腦

洗腦這個名詞源出於朝鮮戰爭，意謂美國士兵被迫或出於誠意地改變立場，參加到中國方面之後，他們的悔過詞與惡名昭彰的莫斯科大逮捕案中的自白頗有類似之處，當然，其中還有不少名堂。不過，毛的不停地整風的新奇處是它不僅限於外國人或敵人，或黨內的清洗，他把「思想改造」的概念提高到了哲學領域中，又同時應用到日常生活來。

毛的洗腦對中國人並不成功，對中國之外的某些自由主義的人士卻成功了，他們相信毛的洗腦不是強制的，指出現在中共在位的領袖們都是從前革命的指揮者，以證明毛與史大林之不同，毛沒有殺掉革命時的同志。這些淺薄的論調忘掉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讓蔣介石

替毛澤東做了史大林必須親自動手的事——監禁或殺害革命同志，包括陳獨秀。不僅如此，毛在成功之前，即已用殘暴的手段迫害革命隊伍中的對手，一九三〇年，在李立三指揮下的工人，佔據了長沙數日，於是，毛「將叛徒解除武裝而清算」了。一九三六年，對張國焘亦是如此。抗日戰爭時，毛取消第三陣線，用的也是同一手段。毛澤東在大陸上取得政權後沒有類似莫斯科案件的事發生，只是因為「革命戰爭中的幹部」都跟隨他的階級合作途徑取得政權，執政後，又贊成他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

替毛辯護中的唯一真實處是毛相信「思想改造」，雖然，這些辯護者並沒有把它當作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為了要在絕大部分為農耕的中國土地上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為了避免無產階級的革命，說服部分資本家和地主在國家經濟中擔任如經理等職務便是需要和渴望的了。

最具技巧的洗腦不是在對朝鮮戰爭中的美國士兵，也不是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它最顯著的成就是在對於那些沒有權力，但又願意獻身為工人階級政權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在目前這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世界上無可避免地有一種風氣，即一些中資階級知識分子把「個人主義」解釋成「集體主義」，那就是說財產和行政都國有化，一切由國家計劃，在戰後的年代中，這種風氣在落後國家中更為盛行。實際上，區別洗腦者於「新政」智囊團的，是洗腦者的領袖毛澤東會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善於運用馬克思的名詞。他更運用這種技巧去向赫魯曉夫挑戰，與蘇聯爭奪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同時，毛也吸引住了一些托派分子的空想，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毛澤東追隨者，儘管托洛茨基與毛曾有理論上的爭執。這些都可

以證明在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捧「國家計劃」為神明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他們甚至於要求受精神上的蹂躪。面對可能引起的核子戰爭，他們毫不畏縮，寧願為正確的「原則」犧牲。儘管左派共產主義分子以東方和西方來區分共產主義陣營，為要更仔細的研究中蘇共衝突，我們不應忽略隱藏在衝突之後的權力政治。

#### 四、中蘇共可能發生戰爭嗎？

##### (一) 一九六〇—六一年：最初的磨擦

一九六〇年，中共利用列寧誕生九十週年的機會，在紅旗雜誌第八期中發表社論「列寧主義萬歲」，將權力衝突轉變成了「革命的理論」。(見北京周報，第十七期)

這篇社論長約四十頁，摘錄了許多列寧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論。一面力貶「現代科學」(即洲際飛彈、氫彈和人造衛星)，認為僅是「今日世界上技術進步的特種小節」；另一面極力攻擊「現代修正主義」，在提及狄托時，很容易看出来是指赫魯曉夫。由於一切證明美國的好戰性是在赫魯曉夫訪問艾森豪威爾以後的一段時期內得出的，這就不難看到「戰爭不可避免」其實並不是列寧的理論的問題，而是針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存原則而發的。

赫魯曉夫正確地認為這篇有關列寧的冗長社論不僅在「毛澤東思想」上，在毛奪取共產陣營領導權的野心上，而且在影響落後地區以及在計劃對美國戰爭的戰略方面，都是一个新階段。講傳，中蘇間會討論合組太平洋艦隊，因赫魯曉夫怕被毛捲入台灣海峽的戰爭中而取消了。但這篇社論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五月一日蘇聯上空的美

國U-2間諜飛機事件所使然。此事件給赫魯曉夫一個機會，不但取消他早經籌備的高峯會議，而且召開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會議來懲戒毛。赫魯曉夫在聯大會中用鞋敲桌子的新聞。他利用那個機會宣稱他是共產主義陣營中的領袖，是非洲革命所帶來的新世界的唯一希望。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八十一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會。赫魯曉夫在此會中將他在聯合國的演講變成了新的共產主義宣言，宣稱蘇聯是「歷史上第一個領導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的先鋒」。當時在莫斯科開會的絕大多數的共產黨都要求毛澤東在宣言上簽字，以對美帝表示共產陣營中的一致。毛無法拒絕簽字，否則，便會露出他對蘇聯的敵意。結果，毛簽了字，但中國國內和亞、非、拉丁美洲卻仍繼續着他自己的路線。

中國不因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宣言上的簽字而改變她為國家利益而走的分歧道路，這與法國在北大西洋公約上簽字後，戴高樂獨自走自己的尋求光榮之路一樣。戰後，六十年代的世界，與歐洲和中國都在破壞中的四十年代大為不同，那時，它們都需要援助，也不得不接受馬歇爾計劃和華沙公約中所聯帶的「哲學」。為了達到目的，毛的革命詞句，連珠炮似的發出，而戴高樂則滔滔不絕的談論「法國的威嚴」。他們兩人都為自己國家有向世界擴展的野心而在本陣營中搞分裂活動。

(二) 間諜飛機被發現後，赫魯曉夫又取得了主動。他欲孤立中共，在蘇共二十二次大會綱領草案中，只用了十個字，輕描淡寫地提到中國的革命。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草案只是為一個國家的共產蘇聯而寫的。它是因為蘇聯的革命有世界意義，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開闢了一個新

時代，一九五七年的人造衛星又超過了美國。再則，赫魯曉夫強調蘇聯的劃時代性不僅有別於美國，也與中共不同，因為蘇聯是在「建設共產主義」。因此，赫魯曉夫在大會上譴責阿爾巴尼亞（實指中共），周恩來為阿爾巴尼亞辯護，責備赫魯曉夫未經預先商議沒有權利在會中公開這種衝突，周並提出大會作為抗議，這些事實都是不足怪的了。他們的互相攻擊、辯護與理論一樣，都是偽裝，毛與赫魯曉夫在這些偽裝下進行着激烈的競爭。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甘乃迪與赫魯曉夫在古巴飛彈事件上的對峙，引起了可能導致核子災難的危機，全世界都屏息注視着，毛澤東認為這又是一個可在中蘇衝突中爭取主動的機會。甘乃迪明白表示，除非赫魯曉夫撤回在古巴的飛彈裝置，則美國不惜冒核子戰爭的危險，一爭短長。在此情景下，赫魯曉夫退縮了。毛立即控訴赫魯曉夫，說他的行為是「在帝國主義面前的懦弱表現」。毛由此更進一步想攫取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要求社會主義陣營在中印戰爭中支持中共。

## (二) 新的階段：一九六三年六月十

### 四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中蘇共間這種新的本質上的不同使得它們的衝突引發為公開的挑戰。在理論方面，亦復如此。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共一封名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完全是這種挑戰的口吻。這封信發表以後，立即又被印成十幾種不同語言的小冊子，分發到有關國家和地區。

中共的工業雖是落後，從鋼、水庫，到原子能的應用方面都很缺乏，但是，它的軍隊從數量到裝備上卻都是上乘的。第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陸軍；第二，這陸軍是亞洲大陸上最現代化的裝備的軍隊。儘管蘇聯諷刺毛澤東，說他在歷史上將會被記載為「如體育運動中的一幕跳高的失敗」。但毛在中印戰爭中卻沒有失敗。「毛的思想」精工於它的着重軍事，因此，毛又在過上面產生了一個新的理論，在六月十四日的六十一頁的信中，毛用了許多遁辭和空話來闡述這個理論，結果適得其反，它只是加重表現他的控制世界的野心而已。

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由五個不同方向說到了「國際主義的試金石」（第十頁）不再是保衛蘇聯。第一個理由是，保衛蘇聯作為國際主義的行動原是因為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但是，「現在有了十三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主義的考驗場所就包括了整個的「社會主義陣營」。控訴蘇聯的第一點理由是，「所以」，「假若任何人……幫助資本主義國家攻擊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即是背叛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稱這種叛徒的行為很明顯的是指責蘇聯不會支持中共入侵印度。對蘇聯的第三點譴責是「在歷史的發展潮流中倒退」即等於「為資本主義復辟服務」，這是針對蘇聯人民而發的。南斯拉夫被指為罪風暴的中心，它們正給與帝國主義以直接的打擊，其真正意向卻指的是蘇聯。

既然亞、非、拉丁美洲國家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它們正給與帝國主義以直接的打擊，這篇中共中央的宣言便將無產階級革命一下子變成了民族鬥爭，「從一方面來說，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關鍵，繫於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的成果上」。

控訴蘇聯「不再是……」的第四點，將重心轉移到列寧的理論（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國際共產主義大會）上去，那是以聯合殖民地國家裏的廣大農民，幫助他們反帝國主義為先進技術的國家裏無產階級的迫切任務。列寧的這個新出發點，在經濟落後國家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性是基於假設上的：假若，「最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的援助」是大量的。因此，列寧強調蘇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明證。毛澤東將列寧的這個說法斷章取義地用來作為與赫魯曉夫爭奪誰去領導新第三陣營的工具。在爭奪的過程中，毛拋掉了把世界分成敵對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和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概念，這個劃分世界為兩個陣營的概念會被毛利用來代替每個國家中的階級鬥爭。現在，他又把這個概念拋棄了。為了要在他舊的久已廢置的「四大階級」政策揪出來，毛又把人民的意義擴大到包括「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王公貴族，只要他們是愛國的」。

當中共在其國際性的宣言中列舉蘇聯「不再是……」的第五點，也就是最後一點時——這是針對蘇聯是「全體人民都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國家」而發的——我們突然面對着所有開倒車論的精英華？「關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總路線的建議」這篇文章一再重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一長段時期裏」，在完成「社會主義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數十年後或更長一段時期」，「階級鬥爭繼續存在，這是不依賴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一條客觀規律」。不管心懷叵測的主要企圖何在——很明白，它的用意是反對蘇聯在二十二次大會中所宣稱的蘇聯在「建設共產主義」——這是所有倒退論中最殘酷的一個。我們現在不僅有了資本主義開倒車回到法西斯的理論，還有了社會主義

開倒車的理論，那就是說一個應當沒有階級的社會裏面，竟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地都是如此」。從來沒有一個稱為「馬列主義原則」的有這樣離奇的說法。

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政權為了民族獨立抵抗強大的蘇聯時，它還不敢像西方陣營中的威高樂，獨創一條光榮的新道路，而毛的野心卻廣大如中國大陸——它的僑民不僅是目前的中國，它包括了帝國版圖的頂點——明朝、元朝所征服的緬甸、泰國、越南半島，當時中國皇帝還派兵去印尼，逮捕錫蘭的皇帝，勒令回教國至少是寵地麥加朝貢。一九五四年北京出版的「歷史手冊」中有一幅地圖引起了尼赫魯的驚異，這幅地圖將蘇聯遠東、蒙古共和國、南、北朝鮮、柬埔寨、泰國、馬來亞、緬甸、阿塞（印度國界內的五萬里地方）、不丹、錫金、尼泊爾、庫頁島和一部分靠近菲律賓的羣島都劃進中國的版圖裏去了。一九六二年以前，除了尼赫魯外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

一九六二年赫魯曉夫引用了毛的話「在帝國主義面前的懦弱表現」諷刺毛澤東，說毛只顧唱高調而不去從事趕走「他自己國土上——台灣、香港、澳門」的殖民主義者。人民日報和紅旗立刻反駁說：「有些人願意我們在這裏提出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他們知道這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嗎？」中共接着解釋由「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侵食（一八四〇——一九一九），早期民主革命時期」，談到帝俄對「舊中國」的掠奪，中國目前的統治者將那些根本不會承認過自己是中國藩屬的可汗、酋長的統治地都概括了進去。（毛澤東嚮往過去帝國的光榮，把泰國的獨立也指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泰國過去是屬於中國皇帝

的，毛希望有一天會恢復中央政府當時所指的「舊中國」的邊界。）

毛處處都顯露出他欲從共產主義陣營出發，進而控制整個世界的企圖。蘇聯撤退對中國的技術援助之後，中國為了戰略的原因，不得不引用另一種「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依賴自己以求建設」，第四十五頁），因此，它不但向蘇聯，而且向現時共產陣營中大多數的政府挑戰。它警告說：「不應當看重『誰是多數』，或『誰是少數』而附和所謂多數……」（第四十七頁），提議以「全體一致」去代替贊成多數的規定，那就說中國對於蘇聯和其它大多數共產黨共同制訂的政策有否決權。可見，目前中蘇共的分歧，不但與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為民族獨立與史大林的衝突有基本的不同，而且與毛自己在一九五七年與一九六〇年間的不一致也有所不同，當時，分歧只限于共產主義陣營之內，還有被平息下來的可能。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可共同證實的唯一事實是他們新社會的不容懷疑的無生存力。國家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新社會秩序的生存力是同樣地被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所證實。那即是說，它們對國內人民的剝削和對外發動戰爭都是不由自主的。我們現在面臨一個驚人的問題：「在這兩個自稱共產主義的政權之間會發生戰爭嗎？」

### (三)回到「戰爭與革命」——中蘇交戰？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這個向極權國家挑戰使得蘇聯與中共有了史大林時期和周恩來——赫魯曉夫時期都未曾有過的合作。反革命報所載，蘇聯並不驚異西方的軍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都是「原子戰犯和狂人」，但是，「中國同志

該內容。中共，在表示與蘇聯帝國反對匈牙利革命的一致之後，即刻加強它自己的國家權力。

儘管臧高染俏皮地發問：「理論上的爭執子野心，還是他趕不上毛的地方。臧大言不慚地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無禮行為並不能掩飾他的機械。」相反地，毛可以兜頭赫魯曉夫，說他為自己裝備其它國家所擁有的具有無限毀滅力的工具。」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辯論中的勝負便沒有多大真實意義了。

目前蘇聯與中共之間還看不到戰爭的迹象。從蘇聯方面來說，不僅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而且蘇聯不願破壞仍以國家計劃為標準而區別自己和「布爾什維克社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從中共方面來說，毛的實力尚不足以向蘇聯巨人挑戰，毛又深信杜勒斯惡名昭彰的以執政的亞洲（北朝鮮、北越）共產黨，再加上非共產陣營中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支持，中共發動與蘇戰爭，實無異自殺。

再則，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列強間的國爭發生在核子時代，全世界人民都是絕對地反對核子戰爭的，因此，赫魯曉夫寧願將與毛的爭執縮小為僅是對於「和平共存」問題的分歧。如消息報所載，蘇聯並不驚異西方的軍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都是「原子戰犯和狂人」，但是，「中國同志

與這些狂人同聲喊叫」，卻使蘇聯感到無比驚訝和悲哀。事實上，反對核子戰爭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兩個致力於公開地反對禁試核子條約的國家——毛澤東的中國與戴高樂的法國——不能不聲明它們這種舉動都是「為了和平」。毛澤東更提出一個反建議，要求「絕對的、徹底的、完全的、堅決的禁止和毀滅核子武器」，由此，毛不但得以攻擊條約本身是「一個大騙局」和「出賣蘇聯人民」，同時，還可以揭露那些「熱情地投入帝國主義懷抱的人們的奴顏婢膝」。毛說：「揭發這些牛鬼蛇神，使它們露出原來面目對于人民的革命鬥爭和世界和平是一樁大好事情」（《人民日報》，八月二日）。其實，毛對於核子災難的恐懼並不如別人為少，不過，他認為這一次這些「有的」國家——美國與蘇聯——將最先的相互攻擊而遭毀滅。即以保存人類文明為念，也不能使毛放棄這種想法。

無可置疑，中共對世界戰略的考慮基本上是與蘇聯不同的。只有中共才有這個膽量談到核子戰後「在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不過，這並不是中蘇衝突的原因，也不是最近中共企圖以種族為理由將蘇聯趕出許多亞非會議的決定點和分歧在毛與史大林的鬥爭中就很明顯，中國一經取得政權，即刻要所有殖民地國家都奉「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爭取權力的基本理論。

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時期和一九五七年赫·毛聯合宣佈反對侵佔多中心論時，中蘇間的齷齪便暫時消失了。很自然地，幫助國外的革命是每個統治階級都願意做的事。每當新的統治階級初登歷史舞台時，因為比它所推翻的統治者擁有更多的羣衆，大都活力充沛，但是，目前這些掌握大權的國家計劃者，即在本土

與這些狂人同聲喊叫」，卻使蘇聯感到無比驚訝和悲哀。事實上，反對核子戰爭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兩個致力於公開地反對禁試核子條約的國家——毛澤東的中國與戴高樂的法國——不能不聲明它們這種舉動都是「為了和平」。毛澤東更提出一

個反建議，要求「絕對的、徹底的、完全的、堅決的禁止和毀滅核子武器」，由此，毛不但得以攻擊條約本身是「一個大騙局」和「出賣蘇聯人民」，同時，還可以揭露那些「熱情地投入帝國主義懷抱的人們的奴顏婢膝」。毛說：「揭發這些牛鬼蛇神，使它們露出原來面目對于人民的革命鬥爭和世界和平是一樁大好事情」（《人民日報》，八月二日）。其實，毛對於核子災難的恐懼並不如別人為少，不過，他認為這一次這些「有的」國家——美國與蘇聯——將最先的相互攻擊而遭毀滅。即以保存人類文明為念，也不能使毛放棄這種想法。

無可置疑，中共對世界戰略的考慮基本上是與蘇聯不同的。只有中共才有這個膽量談到核子戰後「在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不過，這並不是中蘇衝突的原因，也不是最近中共企圖以種族為理由將蘇聯趕出許多亞非會議的決定點和分歧在毛與史大林的鬥爭中就很明顯，中國一經取得政權，即刻要所有殖民地國家都奉「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爭取權力的基本理論。

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時期和一九五七年赫·毛聯合宣佈反對侵佔多中心論時，中蘇間的齷齪便暫時消失了。很自然地，幫助國外的革命是每個統治階級都願意做的事。每當新的統治階級初登歷史舞台時，因為比它所推翻的統治者擁有更多的羣衆，大都活力充沛，但是，目前這些掌握大權的國家計劃者，即在本土

上還未能審視他們有走上歷史舞台的權利之前，便已覺察到勢所迫，有發動對外戰爭的需要了。

戰爭與革命意義不同，它們是相對的兩件

事。既然，毛不會採用史大林要他維持與蔣介石

合作的勸告而取得了政權，毛現在的這些革命大

勝後則確止于侵犯印度的邊界；②中國為達到目

的，可以在作為殖民地的自己國土上如香港與澳

門，與西方帝國主義和平相處，更正確地說是狡

猾的「和平共存」；③「四大階級」政策是「毛

澤東思想」獨創的，雖然如此，毛為了解脫自己

的領土野心，搬用馬克思主義的技巧卻比赫魯曉夫高明得多。實在，一旦受到美國，世界上最強

大的軍事力量挑戰時，毛並不「更為勇敢」，在

台鴻、金門和馬祖，他都輕易下來，比赫魯曉夫，見到甘乃迪真會為古巴的火箭裝置打核子戰

時而輕易下來的次數還多；④不啻毛澤東的革命大話多麼空洞，在具體事件上，毛卻是個選用帝

國主義標誌的專家，他甚至形容「法西斯政權」

為「愛好和平的」。中印戰事未發生時，毛稱巴

基斯坦的軍政府為「法西斯」，一旦中印戰事波

生，毛又趕忙與巴基斯坦聯絡，巴基斯坦也突然

變成「愛好和平的國家」了；⑤毛在亞、非洲，

口稱「保衛革命」，實想有一天能全部控制這些

地區。他稱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為「修正主義分

子」，「保衛革命」的範圍也就因此把這些國家

也包括進去，同時，正如我們所知，他在另一

面又包含了「民族資產階級」，甚至愛國的王公貴

族」。

毛身上奇妙地混合着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加上他的帝國主義野心（包括共產國家陣營內和

蘇聯外，如征服西藏，侵犯印度，垂涎緬甸、越南和唯心主義及唯物主義間的區別，它同時又是結

論：兩種主觀主義是我們所指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工人革命時代的特徵，其一是我們所談到的毛的「主觀主義」，不管客觀情況，以為國家權力就是將六億五千萬人趕進所謂「人民公社」；認爲一小撮持有武力的優秀分子就可以操縱人們的活力，「改造」人們的思想。這種類型的主觀主義充滿了黑格爾所說的「確信自身的現實性和世界的非現實性」，正確地說是將這些國家

第二種主觀主義，則基於「超越在概念與真實之間的對立之上」，它「吸收」了客觀性，那就是說，由於要力爭自由，它不得不去瞭解和應付客觀存在的真實。它的成熟顯示，如馬克思在黑格爾辯證法批判中說：「當一個肉體的人，站在實質存在的地球上，吞吐所有的自然力……並沒有離開地球的『純活動』去創造客觀對

象……此處我們見到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

卷之三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思想鬪爭的時代，我認為在此鬪爭中，要保持頭腦的清醒，就需要先弄清這兩種主觀主義，可惜，此處，我只能略為提示。

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這兩種主觀主義直接的發生了衝突。匈牙利革命使人知道，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是不能被洗腦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樣東西，為了從共產主義之下解放出來，它舉起了馬克思人道主義的旗幟。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不是人類發展的目的及人類社會的形式」。匈牙利自由戰士反對極權政府的集中制度，將工人委員會、青年委員會、知識分子委員會由中央分離出去——即是一種個人與社會不相敵對的統治形式，因為只有個人的自由才是一切自由的見證。

反革命蘇聯用武力將這爆發的初步活動和起組織血腥地鎮壓下去了，加以中國同伴的相助，共同稱呼這種人道主義為「修正主義」。毛澤東之所以幫助蘇聯當然有其原因，他說：「匈牙利事件發生時，我們國內某些人很是高興，他們希望中國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由於毛能够不引起公開的內戰而把反對派制服下去；由於毛擡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一般的及特殊的，如用「公社」一詞，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其意義為自我解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許多新獨立的非洲國家都被它吸引住了。

雖然如此，人民公社中的大饑荒是不可能瞞得住的，同樣，如每一個現代國家，中國國內存在着許多有基本差異的階級，這一事實也是掩飾不了的。要把這些敵對的矛盾變爲僅是毛所說的「新」、「舊」的差別，毛還沒有這樣大的本領。它們不僅不是存在與尚未存在之間的對立，

它們簡直是同時存在的兩種真實的敵對形式之間的公開衝突。壓迫人者與被壓迫者的同時存在，才是它的決定因素，也是自稱共產黨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不能生存的決定因素。

毛承認，與普通的私人資本主義一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個致命的弱點，迫使蘇聯的理論家，在一九四三年修改了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價值論。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管它被稱作什麼名字，所顯示的卻是它的剝削性。蘇聯修改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國修改了馬克思的哲學，其原因是中蘇兩國在工業上有很重要的差別和種種世界危機所致。

蘇聯已演進了一個重要的工業地區，一個具有價值的國家，而中國則還是一大片落後的地域，有的是六億五千萬人口而不是機器。正是這落後狀態使得中國只有用人海的戰術去應付危機——不是解決危機。無論如何，這種二元性，中國新的統治階級與被其剝削的人民間的不可調和的二元性，是隱藏不住的。此外，另一顯明的事實是，世界被兩個爭霸的核子巨人——美國和蘇聯——所分裂，這種分裂活動已擴展到各個陣營中的小凱撒——西方的戴高樂和東方的手澤東身上。

毛的「熟習哲學」與他的不熟習辯證邏輯學，二事互不相干。辯證邏輯學是一種自由的科學，只有從事于為自由而作實際鬥爭的人才能領悟它。這正是人類潛力能被充分利用的關鍵，也正是理論與實踐間的新關係。這新關係可以減少工業化時的痛苦。此外，另一種類型的主觀主義，就是那隱蔽並促使毛澤東把思想鬥爭變為禁

下，毛所精心思慮出來的只能是一個顯子倒退的理論，不是革命的理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特性和其殘暴方式是產生這種理論的客觀壓力和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精神上的破產總是伴隨着資本主義本身的破產而來；同樣的，毛的幼稚的完全沒有哲學方法的思想，正與其國家資本主義進入所謂「人民公社」而俱生。史大林承認在他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價值規律仍然有效，他為了要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中仍有階級存在，就不得不把價值規律和剩餘價值規律分別開來。毛澤東高聲宣稱這是「社會主義」。雖然，毛對於社會主義的概念完全是資本主義式的；雖然，他極度的剝削中國人民；雖然，中共侵犯了其他國家的領土；雖然，中國國內不斷地發出反抗共黨統治者的呼聲，毛澤東的抽象的革命叫囂在國外卻受到許多好戰人士，特別是共黨內外的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談到我們的時代；談到現今自稱馬列主義者對羣衆自我活動缺乏信心的程度，真令人傷心。他們的戰國精神只在有國家權力支持時才能振作起來。這就是現在國家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我們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害怕無產階級羣衆的自我動員比那些無政府極力支持便一無所能的列強國家更甚。